

28701

中央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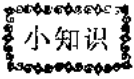
未 央 文 史 资 料

第四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安市未央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西安市矿业学院印刷厂印刷
32开本、约40000字、印数1500本

目 录

珍贵的启示——缅怀方仲如同志·····	田克恭	(1)
深切怀念伯父方仲如·····	方群玉	(13)
忆朱德委员长访问北余寨·····	邹文博	(28)
草滩沿革史·····	蔺祖仁	(34)
国营草滩农场史话·····	李俊才	(40)
西三村的变迁·····	张崇武	(47)
我这个“资本家”的底细 ·····李雅轩口述 窦光宇 李宝香整理		(51)
赴朝慰问片断回忆·····陈万纪口述 邹效龙整理		(60)
未央群众文化断代史略·····	陈桂爽	(75)
“宪政时期”的基层选举内幕·····	田宗锡	(99)
我们走上了光明大道 ——记国民党新五军投诚经过 ·····蔺祖仁供稿 张安祥协助整理		(102)
回忆中条山大会战·····	张晓峰	(116)
“援伊作战”片断回忆·····	马文权	(121)
 小知识 啥是五谷·····	曹蔚彰	(123)

珍贵的启示

—缅怀方仲如同志

田克恭

在中央再三号召我们端正党风的今天，每当我想到许多革命先烈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前辈的感人事迹，崇敬之心，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我们怎么会有今天的和平、自由、民主与幸福生活呢？方仲如同志就是我怀念和尊敬的革命前辈之一。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仲如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党派他在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对外的名义是“上海福利电汽公司另件制造厂”）工作。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七日被捕入狱，因无确凿罪证，于一九三六年八月，据保释放。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

后，他由蒲城尧山中学回到西安，我只见过他一面，可他平易近人、坦率、热诚的为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仲如同志随彭德怀同志进西安，接着担任了西安市政府的市长。

对敌的启发

解放初，政府即派我为东郊韩森寨的西安市立第二中学校长，这是解放前办的一所规模较小的初级中学。九月初开学不久，秋雨连绵四十余日，尚未顾得修缮简陋的校舍，房屋无一不漏雨水，校围墙也大部倾倒，几乎无法上课。师生们围着我诉苦，我心急如焚，无奈只好冒着大雨进城找方市长。我在田间一条泥深而滑的小路上急行着，跌倒又爬起，踉踉跄跄在雨水中向前冲。当我快步进入市政府一个院里，看见市长、秘书长何寓础、秘书主任朱茂青（二位曾是地下党同志）正站在大厅（清代的

“四来堂”）门口观看一滴一个泡的大雨，我立即火冒三丈，把多日来的焦虑、愁苦和抱怨一下爆发出来，忘记了上下级关系和友谊，怒不可遏，迈大步向他们走去，大发牢骚喊道：

“找你市长来了！你们好自在，在大房底下看雨景，我的学校墙倒房塌，学生围着我哭，要干住处，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管不管？……”，我激动得不知道以后还乱说了些甚么气话。他们看见我闯进院子，裤角高挽，臀部、满腿满脚都糊满了泥，寓础赶快拉我上台阶，接过雨伞往屋内让，仲如同志惊讶地说：

“哎呀，淋成这个样子，衣服都湿透了”。随即拉着我的手慰藉地说：“不要生气，赶快歇一下，喝口热茶，暖暖身子，有话慢慢说”。并叫茂青快给我拿件衣服换上。市长对我的大发脾气，毫无责怪的神情，且拉我坐在他身边，和颜悦色关切地说“边么大的雨，路很远，

你的身子又单薄，办啥事，派别人来就行了，把你弄病了，咋办？”他倾听了我的汇报和找新校址的要求，立即严肃地对寓础叮咛：“赶快给彦博（张彦博同志当时为二中所在地的七区区区长）打电话，必须今天就将二中全体学生安排在庙里、老百姓家里挤着住。另外，先拨点钱抢补修校舍，”又转向我说：“你也配合教育局在城内物色，看有没有较合适的地方，干脆把二中迁到城里来。”当时，没有给二中另找下地方，政府很快拨款修理了全部校舍，新筑了全部围墙，学校焕然一新。这次我大发雷霆的事，过后颇感内疚，觉得那样粗暴太不应该了，当然也担心领导同志会见怪。而后来事实全非如此，仲如同志每见到我总是先向我含笑打招呼，握手问候：“克恭，还好吧？忙的很吗？”

我当时想，当市长的人能那样谦虚、慈祥、

宽宏大量，对处理问题那样认真迅速，对人民、对下级的疾苦那样关心，这对我如何作领导工作，如何对待干部、如何处事、对人、怎样修养德性、都有启发，使我终生铭记。

庄严的号召

仲如同志在任何场合的报告，或广播讲话，都很切合实际，语言生动，鼓动力强，为广大听众热烈欢迎且心悦诚服，使大家受到教益。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间，我住在南关中医医院治病时，一次听到方市长号召增产节约的广播讲话很有说服力，我极为感动。当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极需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人人节衣缩食励行节约，努力生产，以便能胜利的完成这个宏伟计划。听讲话后，我算了个账，假若全国每位十二级干部退到十三级，每月少拿一级工资，估计省下的钱可办几座大工厂，所以我决心要退回一级。而领导

上认为升级降级不是随便的事，坚决不同意，经我再三申请，直至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省委才批准了我的请求。到一九六二年重点调整工资时，有些同志提出应给我恢复原级别，被我决意谢绝了。因为仲如同志的讲话在我心里扎了根。数十年后的今天，为了祖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难道就不该节约了吗？仲如同志当年精辟的讲话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任干部 爱护干部

一次，我去市委听报告，会结束后，我刚出大门即感到一阵眩晕，心里很难受，像要休克。正在此刻，方市长坐车出大门经过我身旁，透过车窗看到了我，立即叫停车，他见我的脸色不好，急下车扶住我问：“怎么了？不舒服？快上车！”扶我上车后，急说：“机关有车，为啥要省汽油不用，你看累的！赶快去医院！”我勉强说“一会儿就过去了，不要紧。”

于是，他用车送我回到了建国路中苏友协机关，并再三叮咛：“如果还觉得不舒服就赶快去看病，无论如何不要耽误。”

五十年代初，仲如同志兼任西安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我是省、市中苏友协秘书长，平素我与宣传部联系多，且因会长太忙则与之联系少。一九五八年友协开代表大会改选时，他坚决要辞掉会长，叫我担任这一职务，我不同意，向他说：“堂堂西安市涉外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一定得请市长您担任，西安的苏联专家很多，必要时须您出面；我的能力差，在社会上没声望，绝对不敢负此重任。请原谅这次不能听您的话。”他郑重而诚恳地说：“能力是锻炼出来的，你在友协这么久，工作好，业务熟，完全可以胜任，大胆地干吧！就这么定了。”他又叫宣传部负责同志给我说，我再也不好违背他培养使用干部的盛意了。一位省军级

干部，对下级如此平等对待，如此亲切关心，又如此信任培养使用，是不多见的。这些启示，对我这样个基层负责干部是多么珍贵呀！

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仲如同志从不特殊化，不以权谋私，廉洁公正。他在担任市长的十几年间，日夜操劳极为辛苦，确实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忠实的勤务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声望，“方市长”这一称呼已为全市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九六三年，他被调任中共西北局监察组长，为严肃党纪，维护党的纯洁性作了大量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既坚持原则，又讲工作方法，深受党内外同志们钦敬。这也启示我如何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并永远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维护党纪、端正党风首先应从“我”做起。

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一九六四年起，仲如同志患病，一直在家休息；但“文革”开始后，对病人也不能幸免，他反复遭摧残，家属受株连，直到病体不能支持，仍被赶出西安，被“安置”到大荔县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改造。从一九六八年初，付发他的工资，每月只给十三、四元的生活费，还经常受打骂凌辱，但他始终对我们的党充满信心。

在“文革”中，我也同样受到严重摧残，当我自由后，打听到方仲如同志出了“牛棚”

（“文革”中，把关押“走资派”的地方叫“牛棚”），从大荔农场回来治病，住在东举院巷的家里，便赶快去看望他。相见之下，他很惊讶，激动地紧握住我的手说：“别人都避嫌疑不敢到我这儿来，你咋敢来？”并问了我的状况。他还是那样胸怀坦荡，谈笑自若。他见

我很瘦弱，说话气短，便慈祥地鼓励我：“要乐观，好好治病，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做哩。要能吃能睡，相信党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

大约在一九七三年，我打听到给他定了案是“叛徒”，又被赶到眉县去劳动改造。以后听说让他回西安看病，住在和平路西二道巷一个小院内三间宽的两层简易楼上。我又想去看他，朋友们劝我：“方已定了叛徒，你的问题也没解决，若去，人家说你划不清界限，不是更罪加一等吗？”但我坚信仲如同志不是叛徒，而是革命一生的好党员，好领导干部，还是去了。当时，连平时很熟的朋友们都避免来往，以免惹事生非。所以他见了我很诧异地说：

“你怎么还敢来？人家说我是叛徒呀！不怕连累你吗？”我急迫地问了他的病况后，气愤地说：“不管那些混账说你是个啥，没人信，我也

不怕，头割了碗大个疤！”“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问心无愧，问题总会弄清的你放心，你看我不是挺好吗？……”他虽然仍是开朗地笑着，话也很多，但我看他的体质和精力较前几年差多了，显得苍老了许多，心里暗暗难过，再三叮咛：“一定要好好治病，希望您老健康长寿！以后是非澄清了再多工作几年。”他又兴奋地说“咱们共产党人要经得住考验，不管他们（指“造反派”）怎么胡闹，咱们总是实事求是，……”。不料这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畅谈！仲如同志在他历尽坎坷艰辛的征途中，总是胸怀开朗，光明磊落，威武不屈，铁骨铮铮，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对我们在有生之年应如何勇敢、坚强、有意义地活着，不是很有价值的一面镜子吗？

他的心中只有党。当“四人帮”被粉碎后，仲如同志的问题得到了澄清，给补发了近十年的工资，而他并未把这笔款项留给后代，全部交了党费。这又一次说明了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他高尚的思想境界。

三中全会后，仲如同志在北京抱病参加全国政协工作，到一九八三年六月五日逝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人们提起当年的“方市长”，还是称赞不已。数十年中，我虽未与仲如同志朝夕相处，但他给我的若干启示已是很珍贵的馈赠了。他的音容仍活生生的在我心中，他的英名载入了史册，他永远被人民怀念着！崇敬着！

深切怀念伯父——方仲如

方群玉

我大伯方仲如是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新店村人，是我们陕西省早期共产党人之一，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赤胆忠诚，只要是党分配的工作他都千方百计地去完成，任劳任怨不计名位。不管是旧社会在敌人的监狱里受手镣脚铐之苦，还是在新中国十年内乱期间的“牛棚”生活，他都是铮铮铁骨坚信党，对党忠贞不二，他永远是我们后辈的光辉榜样。

大伯一九〇一年二月二日生于新店村，少年时代在本地私塾读书，后在陕西省第三中学读书。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他开始接受了新思想。一九二一年夏，他中学毕业后就到北平考大学，招考一毕，又努力补习了

一年，终于在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先后认识了李学舟、呼震东、刘天章、杨晓初、韩仲范、杨克强等陕西乡党，思想上很谈得来。那时，他们有的已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了，就创建了陕西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当时和大伯同班的乡党还有耿炳光、王德崇、岳劭恒，也都是参加了。一九二四年春，由刘天章介绍大伯参加了社会主义共青团。从此，他除了担任共进社半月刊的发行工作外，还担任共青团和国民党支部的日常工作，做些宣传先进思想工作，兼给北大夜校教书，给陕西到北平升学的学生补数理课。孙中山先生到北平后，召开国会国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大伯参加了筹备工作。一九二五年夏，北平学生为抗议反动派在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在北平召开的群众大会，他是主席团成员之一。由于他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影响了学业，留了级，